

西方城市社会的文化进化 规律及社会问题研究^{*}

——新城市社会学的认知视角与创新

张鸿雁

内容提要 中国的城市化是在西方城市化理论影响下发展的,以政府为主导推进下的高速城市化,使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深刻的快速转型期。当中国城市社会来临的时候,我们不仅缺乏对中西城市化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比较研究,更缺乏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反思与扬弃,而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批判,是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的前提与基础。

关键词 城市进化 城市化 西方城市化

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说“当一个人已在一种独特的文明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并经常试图找到这种文明的源头及其所由发展的道路的时候,他有时也禁不住朝另一个方向侧瞥一眼,询问一下该文明未来的命运以及它注定要经历什么样的变迁。”^①我们生活、居住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城市文明里,在研究中国城市文明的社会进化与社会问题的时候,必须抬眼向西方看一看,在西方城市进化与社会问题的关系中,寻找人类城市进化的同一性和差异性。通过比较研究获得相对完整和科学的理解,才能正确总结、认识中国城市进化与社会问题发生的相互关系及发展规律。

古典城市进化与西方文化核心价值
产生的社会原因及问题

西方城市的历史从爱琴文明发源,这种典型

的迈锡尼文化创造了全新的城市文明。这一新的城市文明发端,给人类带来了西方式的、古典时代特有的城市文化与城市空间形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延后发展而来的古希腊罗马的城市文明,通过外来原始文化与当地文明的文化整合,创造了以城邦为单元的贵族化平等的市民空间,又可以称之为奴隶社会的“城市贵族民主文明”和“城市贵族的城邦民主制度”,从而建构了西方城市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古典模式,并奠定了西方社会发展政治生活、文化社会和城市制度的基础。这一时代的法律、政治、思想、宗教、艺术、文化和城市生活,在贵族城邦民主的土壤上,生长出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神话经典,堪称创造了西方城市文明与文化的黄金时代。就其本质来说,这一时代是创造西方市民社会民主“文化基因密码”的时代。罗马时代城市空间要素的完整性和贵族生活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特色文化城市研究”(项目号:12&ZD029)的阶段性成果。

的丰富性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在芒福德的研究中,曾专门分析了罗马时代的广场、大剧场和公共浴场。“演说家们就在这些空场上对大群听众发表言论”,广场周边都是大厅,“遇恶劣天气,各个大厅都可以容纳听众”。^②芒福德还专门研究了这一时期的浴场,作为一种城市生活和城市生活质量的集中写照,罗马时代的浴场具有特殊的城市文化符号意义。他说“罗马对城市卫生和城市形式最典型的贡献,大约要算是浴池了。从有关大型浴池发展的记述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出罗马城乃至罗马帝国本身的简练历史。”^③而且“罗马浴池以其巨大规模、以其各种设施的结合(如果没有其他时髦特点)完全可与美国的现代购物中心相媲美”^④。芒福德在他的书中也通过图片介绍了英国巴思在古罗马时代的城市 and 浴场,充分展示了那个时期城市生活的奢华和城市的繁荣,并题为《巴思的骄傲》。从西方古典时代城市进化的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城市化与城市文化的一般进化规律“地球上每一时期的居住者都在生存竞争中击败过它们的前辈,因此,它们在自然的等级上就更高,这或许可以解释许多古生物学者们所体会到的那种模糊的、定义得不正确的感情:从整体上来看,有机体进步了。”^⑤城市社会就是一个有机体,这种进步本身是一种进化,是城市文化形态在更高一级层次上的发展,并且是一种远离动物本能、表现社会群体理性的文化进化。

西方古典时代的文明,之所以称为黄金时代,是因为这一文明本身表现出典型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择优进化的特点,即人类的伟大文化^⑥与人类的致命弱点同在。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⑦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⑧中都曾提过类似的观点:任何文明都必然表现为发展与进化的过程,世界上任何文明形态的进化都会经历发生、发展、兴盛和衰落的过程,甚至会出现文明与文化类型的死亡,以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都曾此类证明,如玛雅文明的死亡等。但是,在自然法则的意义上,某些自然因素或者社会文化因素的死亡,是另一类或者是新因素、新文化类型生长、进步的土壤和前提。虽然这一结论对解释城

市进化与城市社会文化变迁有些牵强,但是,人类社会发生以来,许多民族和地域文明都出现过发展、衰落和再生过程,更出现过辉煌之后文明灭亡的例证。

当罗马帝国的奴隶制走到了尽头,奴隶制本身的弊端便显现出来,随着罗马帝国走向没落,罗马的城市也随之开始衰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论及罗马城市衰亡时说“帝国越是走向没落,税捐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落后,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⑨很显然,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城市文明的辉煌本身缺乏真正的历史动力,这一进化本身带来“负进化”否定了自己,整个罗马的国家与城市深深陷入社会问题的激流之中,罗马城市的衰亡曾一度导致中世纪初期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退化。

在古典时代之后的中世纪,有相当长的时间,城市普遍衰落并遍布欧洲,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缓慢的社会发展之后,新的外来文化进入原罗马古地,又一种“原始民主”文化与当地的文明相结合,从而挽救了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形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文化创造期——城市文艺复兴时代。虽然罗马的城市衰落了,但是,古典时代的城市精神还在,古典时代的“城市文化基因密码”仍然存在。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文艺复兴在创造性展示、复制和发展古典时代“城市文化基因密码”方面,显示了城市进化和城市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对古典时代文化、艺术、思想和政治等“文化基因”的复制与再造,极大地提高了“人本原”的能力和价值。有学者说“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这一尊重的基础是人的潜在能力,而且只有人才有这种潜在能力,那就是创造和交往的能力(语言、艺术、科学、制度)……”这些个体的能力一旦释放出来,使人有了“一定选择和意志自由,可以改变方向,进行创新”。^⑩而这种情况必须具备两种前提:一是教育,二是个人自由。^⑪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世

界新的地理大发现,东西方国际间经济与文化的大交流,大大提高了当时社会生活与消费的水平。同时,新的商业化的城邦体系和城邦里的生活方式也极大地解放了人性,思想的解放带来了中世纪城市进化的文明高级化的发展,由此引起了一个典型的社会结构变迁,即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入了工业社会。

当时的思想解放遍及各个领域,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教育、日常生活和政治体系,这一过程创造了全新的经济形态与社会机制,塑造了新兴的工商业者,进而也创造了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商业行会、“独立经济人”和“独立经济人文化”等。同时,在这一基础上孕育出了新时代的、以工商业者为主的“城关市民”,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他们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前身:“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⑫城市在进化,从奴隶主贵族的舞台转化为封建领主的舞台,又转化为城市市民社会的舞台,由此开始,马克思称其是“历史的真正出发点”。

从城市进化的角度看,西方城市从迈锡尼文明的集权专制的城市文化,转化为古希腊的城邦式国家模式,这是一种原始文明接替迈锡尼集权文化进化的结果。随后古希腊文化又被古罗马文化取代,在城邦国家的基础上,转而走向罗马的集权国家形态,使古罗马厌恶劳动的贵族奴隶主民主走向顶峰,又从顶峰走到尽头。这也是一种进化的表现模式,应该说这是人类总体进化中的局部“负进化”。当一种文明在高度发展某一面,而忽略人类本原文化和忘却人的尊严时,必然导致进化过程中伴生社会问题的深化,进而会将自己的文明所吞噬,古罗马便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城市进化是社会进化的结晶之一,是社会进化的时间切面。从古希腊起,古典时代的城邦制度创造了包括贵族和城市平民在内的城邦民主制度,这样一种城邦民主体系既表现在国家与城市制度层面,又表现在文化艺术和日常文化生活层面,同时还表现在城市空间文化场域的再造方面。如从古希腊时起,城市中就有了属于城市市民的市政厅、城市广场、城市法庭、原始的“城市议

会”、城邦法律,从而构成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空间文化,使城市进化具有了新的意义——城市有了真正属于城市居民整体的公共生活空间,如图书馆、剧院、公共教育学校、公共艺术空间和公共休闲设施等。城市进化一直表现了功能的多样化、复杂化和生活的品质化,在罗马的庞贝城废墟的居住空间中,可以看出当时贵族和城市平民生活的情境。而这一时期的城市还出现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区隔,或者称为专属的公共空间文化,城市空间的文化意义在一定社会层面——贵族之间和贵族与平民之间体现了某种意义上民主和公平的价值取向。当然,这种所谓“一定社会层面”的空间民主和公平是以丧失底层社会——奴隶群体的民主与平等利益为前提的,是以丧失底层社会群体——奴隶群体的空间公正为前提的。对于奴隶群体来说,空间的真正公平与正义是不完全存在的。但是,这种一定群体和社会层面的民主文化为后来的城市文艺复兴,甚至为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城市的发生,创造了历史的前提。

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进步,都必然以负面文化的深化为其时代特征,这也是人类社会进化“二律背反”的必然规律,亦如马克思所说,每一次历史进步都是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的,虽然这种理论有些偏颇,但在本质上说明了人类进化和城市进化过程的艰难与伟大,城市的进化必然伴有相应时代社会问题的深化,包括相关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其核心理论、基本原理及价值取向就是:城市进化的主体是人类正向的高级化进化与进步,但同时,也必然出现人类社会的负面问题,即所谓“负进化”的深化。这也证明了人类的“社会文化选择”和“自然文化选择”的文化模式具有双重性的进化特质。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动物在某些功能方面获得特殊进化时,其他方面的功能必然退化。虽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进化不能和低等动物的进化相提并论,但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证明,伴随人类社会进步和进化,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复杂和深化,这说明人类社会本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弱点,而我们总是试图在研究人类进化、城市进化的过程中,寻找人类克服弱点、获得进化的方

式。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的进步,永远处在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人类在进化,人类的问题在复杂化。社会进化在创造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也在创造人类社会的新问题。不言而喻,城市在进化的同时,也在创造城市社会的新问题;人类在创造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时候,也在创造现代化病和与现代化相关的社会新问题,这是社会病理学带给我们的一种实践与理论的结果。所以,人类在进化中创造了自己的问题,同时也在进化中创造、优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在西方古典时代的奴隶社会里,城市是阶级差异、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集中地,城市贵族的某种民主政治,是以剥夺奴隶的尊严为代价的城市政治。在当时的生产力前提下,城市进化所伴生的问题是极其深刻的,牺牲了底层社会的存在价值,创造了贵族和平民的文化体系。这一时期的建筑、艺术、哲学、宗教、文学和科学都达到了当时的顶峰,之所以会这样,就是由于古典时代的城邦政治民主的进化,这种城邦自治的奴隶主阶级民主的高级化进化,是以城邦贵族群体的内部平等为表征的,特别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和古希腊罗马的神话精神之源,创造了人类文化的黄金时代。西方古典时代的城市进化表现了城市的伟大,并以延续的历史风格、人类的集体记忆^⑬和穿越时空的哲学思想,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为后来人类文化进化的优化选择提供了基础和土壤。

中世纪城市进化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嬗变及合法化危机

西方中世纪的城市是由逃亡的农奴建造的,这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农奴逃亡到城里,并“在城市和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⑭。这一时期的城市,在继承古典时代的科学、技术、文化和思想的遗产之后,城市社会在进化中形成全新的社会分工,在城市里存在着全新的群体和职业,有王公贵族、商人、手工业者、僧侣和逃亡的农奴,城市成为手工业和商业的集中地。在相关的文献中,我们能看到西方中世纪城市里

各种不同职业和长长的职业阶梯以及职业名称。但关键是,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居民以工商业者群体为主,这个工商业者群体通过自己的组织创造了城市“法人”实体。有学者论证说:“中世纪的城市本身是一个个体,但是一个集体的个体,即一个法人。”^⑮城市具有典型的自治性,并以充分发展的行会和商业联盟为其时代特征,这种城市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态关系,与资本主义的核心文化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城市文化基因”的联系。

中世纪市民的发展与封建制度不相容。“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是欧洲革命的因素。它在中世纪的封建组织内已经赢得了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存在,同封建制度的继续存在已经不能相容了。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灭亡。”^⑯很显然,在一个充满矛盾和对立的城市中,其相关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整体性的。马克思强调说,资产阶级把原来“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一部分有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⑰这一发展本身就是城市社会进化“自然法则”的表现,这一进化的方式以阶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为主要内容,而且这种生产力进化在推动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否定自我的力量。

在封建制度瓦解之前,城市社会历史上从未有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当这两个最初以对立形式存在的阶级在城市社会结构关系中形成对立统一体后,其本身的矛盾与冲突就构成了当时城市社会问题与矛盾的主体——这是城市特有的现象。在这两种对立的社会关系中其文化存在模式是可以想象的: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奢华、享乐和财富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底层社会的贫困、不公平和无望的生活,这种对立的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存在必然导致社会冲突的发生。在封建制度解体后,西方开始了工业社会的发展。在大工业生产的前提下,技术改变了城市和城市文化,也改变城市进化的方式。这一时期最显著的进化是城市组织形式、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和空间形态的进化。大工业生产促进了城市社会组织形式的规模化,技术和新的生产力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群体。

“以蒸汽机为动力、为世界各地市场生产商品的工厂,是扩大城市拥挤的第一因素,那么,新的铁路运输网在1830年之后就大大促进了城市的扩大和拥挤。”^⑮现代工业技术使工业集中在城市成为可能。

资本主义发生的时候,城市经历了血与火的战斗洗礼,演绎了一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的“城市戏剧”。瑞士学者 Carl Fingerhuth 在《向中国学习——城市之道》一书中把城市分为多种类型与功能,其中一种就是“作为舞台布景的城市”、“作为梦想之地的城市”。^⑯城市舞台新主角的出现既是历史的进化与进步使然,同时也表现出人类社会悲剧的一面。工人阶级的贫困成为这个时代的集中写照,工人居住的贫民窟成为这个时代社会问题的主要代表符号,利用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与资产阶级群体的富有生活和奢侈,甚至成为这个时代的生活样板。在城市进化的自然法则体系下,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资本家阶级成为城市进化的直接受益者,而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与城市污染、阶层分化、城市犯罪等一起构成城市进化的负面符号和社会代价,成为这一时期城市进化的主要伴生问题。恩格斯在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⑰提供了当时工人阶级的生活样态,清楚地描述了这一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恩格斯当年描述英国工人阶级贫困生活状况的城市,就是后来成为“世界城市”典型代表的曼彻斯特。这个城市进化的过程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在城市进化中,应该努力克服城市进化带来的越来越高的代价。

在工业化早期,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显示着人类社会进化的方式与步伐,城市的生活方式给人的发展与享乐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从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拉力,吸引着大量农业人口涌向城市,城乡之间的人口转移成为城市进化的外部“动力因”之一。城乡间的人口“这种不同寻常的大规模迁徙从根本上重构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城市和田园之间、有文化的和乡巴佬之间、神圣的和渎神的之间的早期差别,并刻记下了一个新的都市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中,社会剩余价值

的生产不仅仅被城市协调和控制,而且在历史上第一次在城市的内部、在城市空间的人口密集中心周遭发生”^⑱。1850年,英国的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人口,这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国家的地域范围内,城市人口超过了农业人口,这也预示着人类全面进入工业化时代,同时也预示着人类未来必然会进入城市化时代。与英国的城市进化相比,中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业人口是在2010年,这一发展水平整整比英国晚了160年!

初期的工业化是以蒸汽机、钢铁、铁路、机床和世界活动为技术特征的。而工业化的高潮阶段,特别是20世纪以来,则是以内燃机、电气工程、汽车、航天、广播及无线电通讯为核心技术价值。新的技术创新使城市的空间得以进化,铁路使城市间的远距离交通成为可能,让城市结构性和系统性的进化可以在更广阔的地域展开,为城市的现代性提供了空间基础。工业化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工业化需要城市的空间要素,如“工厂、仓库、商店和办公室、交通网络、大型劳动力和消费者市场等物质基础。相应的工业化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内部结构和功能……工业时期还带来了中央商务区(CBD)的开发,它为新的公司提供了办公建筑和企业总部”^⑲。这些新的城市空间体系,为城市新的系统性要素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场域,并成为城市向高级化进化的新动力源泉。

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了城市社会的发展阶段,即城市人口普遍超过了50%,城市成为现代市民社会深化的舞台。城市社会的来临,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与新生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平台上,宗教获得改革;政治体系得到创新;新的科学技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内核;新的资本主义宗教伦理获得进化式的改革并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融为一体;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民主获得了全新的发展;古典时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原则在工业社会中获得了新的地位;新的技术、新的信息科学和智能产业,为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关系注入了活力,这也使西方城市社会实现了整体社会民主化的进化,特别是在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形成的

不同群体和不同阶层的共同利益的创造,使个体自由和全面竞争能够较为充分地体现,加之在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形成的新经济形态,如新企业制度、股份制的再社会化以及全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使社会企业、私营企业和国家企业共同获得了社会整体意义上的价值和全新的意义,使社会全员——或者说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为社会发展的受益者——全民国家、全民福利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空间与社会关系成为社会整体发展的主体模式。城市社会进入相对公平的、具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多元社会发展的进化过程。

西方城市社会与后工业 社会双重文化价值的整合

由于科学、财富和民主三要素的三重进化,西方城市社会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获得成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入城市社会发展形态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城市人口已经接近70%,这不仅使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更表现为城市社会的“市民化国家形态”,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高级进化。1954年美国白领阶层人数超过了蓝领阶层人数,白领阶层以全新方式登上历史舞台,传统的以工人阶级贫困为代表的城市社会问题,转化为社会整体意义上“中下层社会相对贫困”为代表的城市社会问题,并以多样化、国际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现代社会群体政治利益和宗教利益的冲突、环境污染、极端主义文化、过度消费、虚拟经济、现代都市病和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

这种社会转型使城市社会的整体功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城市市民成为城市的主人,城市建构了以市民社会关系结构为主体的空间构成形式;另一方面,与城市社会来临相伴生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技术化、规模化、全球化和非典型化,如社会关系的重组、新兴城市经济与产业结构空洞化、世界问题的一体化等。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每一座城市都具有世界经济节点的功能,国际城市间的影响度和相互依存度都在增长,相关问题也

会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任何城市发生的社会问题,都可能导致社会问题的国际连锁化,城市全球化使城市进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的深刻化具有全球性。城市进化的世界一体化,也同样带来了世界性的城市社会问题。

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城市进化中,一直是以社会分工深化及产业分化为其主要内涵,以城市空间结构变迁和城市规划的扩张为外在表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城市进化的核心价值是城市自然属性的某种程度的回归,知识经济创新、系统工程、咨询决策和信息的影响力增大,城市进化的理论和发展主张也出现多元化的模式,人本文义思想、城市生态化、新城市主义、城市空间的自然化、紧缩城市理论、有机城市理论等,引导着城市以多元化的方式发展。后工业社会的城市进化,在某种程度上说,蕴含着使城市重新回归人类本性的进化,城市进化的方式得以重构,多元化发展的外在形式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复古主义的城市复兴,传承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二是后现代新兴城市文化创新,出现了一些全新意义上的城市发展体系和模式,主要体现在现代科学技术、高新技术、电子化的发展、信息化、数字化、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带来的生产领域的革命,使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三是城市自然属性的回归,如以生态型建筑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城市开始进入“后都市主义时代”。

后现代社会的城市进化,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能够看到随之而来的变革:都市农业发展、生物技术扩张、机器人广泛使用、现代医疗技术综合化、零耗能城市居住模式的出现等。城市出现了全新的空间样态,不以集聚作为城市生活方式的特征,而以城市生活方式的“后都市化”作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城市生活方式无处不在——不仅在城市里,就是在原来的农业地带,在广袤的土地上都有城市生活方式的载体,城市变得无底、无形、无边,并以“群化”的空间形态进化,创造了全新的地域生产结构。丹尼尔·贝尔曾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描述过这样的城市:“一个大规模的社会的特点不在于巨大的人口数量,或者

说不只是在于人口数量,而在于人口的集中和密度。土地辽阔的社会可能有大量的人口,但是过去,他们分布在广大地区,他们的社会组织基础是分散的、不是整体的。只有当这种分散状况被打破和人民的相互联系影响日益增加的时候(过去是通过大量的城市集中,今天是通过大规模的通讯交往),一个大规模社会的特征才显示出来。”^{②3}甚至城市中的居住人口构成也是世界化和国际化的,而城市市民的生活则是克里奥化的。

后工业的进化所带来的城市社会变迁是显性的,同时,后工业社会的城市进化的代价也是显性的,城市的过度扩张、农业用地的减少、畸形消费与浪费、生活主体价值的偏离、传统道德的丧失、人性的缺失、极端宗教与暴力以及虚拟经济带来的就业不充分等负面问题,既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复杂性和全球性,又具有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性,如网络犯罪等。甚至可以说,后现代的某些社会问题是现代技术发展的一种结果。

后工业社会的城市进化,把传统社会带入了以城市空间生活模式为主的典型的风险型社会。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成为全球经济与社会价值链的中间环节。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世界上所有的城市无论是生产还是竞争都具有全球化,其竞争范围也都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全球化特征。无论城市规模大小,只要试图寻求新的发展,就必须在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城市面临着高速扩张的空间结构、高速增长的城市消费、高速发展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和转型,日益成为一个地域体系。一方面是地方性“群团化”的城市发展结构,即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发展状态;另一方面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竞争的挑战。每一个城市在思考与世界一体化的同时,还必须寻求城市地方性价值的建构,以求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能够找到自己的坐标,而不至于被世界一体化“虚无化”了。人们已经认识到,城市特色文化和特色经济模式的发展,是使城市能够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核心价值与基础。

21世纪初,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使城市间形成某种全面的依赖关系,而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和经

济结构往往表现为多样化的城市间的关系,一些大城市成为世界超级经济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总部经济、跨国公司、国家利益是世界级城市的主要元素,一些城市进化为一种超级经济体和超级地域性空间结构,特别是城市的智能化体系形成的城市与外部联系,使一些城市成为世界的核心、“结点”、“区域管理中心”、“协调极”和“发展极”。在全球化的城市进化中,虚拟经济和信息爆炸创造的现代社会的“信息非对称结构”,引发了各种形式的危机,包括政治危机、金融危机、环境危机、合法化危机、合理性危机、信誉危机等,在现代社会的高强度技术手段的维持下,不仅各种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各种新型危机层出不穷并造成社会动荡频率的上升。

城市不仅集聚了产业和经济要素,也在集聚消费和文化,而过度的城市消费和不合理的非科学的发展模式,会断送城市的发展前程。“因水源断绝或干旱而废弃的有:中国新疆的楼兰城、高昌城,非洲的大津巴布韦,美国印第安人的梅萨维德悬崖城。中美洲伯里兹原首府伯里兹城被台风荡平了。中国陕北的统万城被流沙掩埋而废弃了。”^{②4}中国的西安曾在世界历史上有过耀眼的辉煌,堪称世界级都会,可是过度的国家政府负担和畸形的过度消费,使关中沃野一度成为赤土贫瘠之地,也使西安在唐朝以后几乎是永久性地失去了都城的历史地位!

“城市社会进化过程就是对旧我否定的过程,是一个‘理性化社会的理性发展过程’。”^{②5}这是罗马俱乐部成员E.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一书中的话。这一观点从更高的层面告诉人们,社会进步一方面是对人类认识自己创造宇宙发展的一种检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文化再造的文化密码——是人类文化伦理的一种进步,这种伦理文化可能使人类社会在进化中,社会整体功能能够越来越多地为社会大多数或者是为社会全员着想,进步的合理性包括对社会理性人的全面解放和使多数人价值愿望得到满足。^{②6}

①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文明》,徐洋、何桂全等译,国际文

- 化出版公司 2001 年版,第 1 页。
- ②③④⑩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7、241、242、470~471 页。
- ⑤参见彼得·狄肯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与社会理论联系起来》,涂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⑥乔万尼·波特若《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刘晨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
- ⑦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08、313 页。
- ⑧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99、224 页。
-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169 页。
- ⑩⑪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234、234 页。
-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67 页。
- ⑬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页。
- 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7 页。
- ⑮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梁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11 页。
- 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47 页。
- 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60~61 页。
- ⑱Carl Fingerhuth《向中国学习——城市之道》,张路峰、包志禹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 页。
- 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06 页。
- ⑳Edward W. Soja《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4 页。
- ㉑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城市化》,顾朝林等译,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51 页。
- ㉒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銛、王宏周、魏章铃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348 页。
- ㉓参见李原、李洋编《被毁灭的城市》,学林出版社 1985 年版。
- ㉔E. 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李吟波等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99 页。
- ㉕张鸿雁《城市文化资本论》,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56 页。

作者简介:张鸿雁,1954 年生,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社会学会会长,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丁惠平)